

现代满语与汉语

赵 杰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现代满语与汉语

赵 杰 著

辽 宁 民 族 出 版 社

1993·沈阳

辽新登字 7 号

现代满语与汉语

赵 杰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90 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3/4
印数: 1—5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林英淑 责任校对: 白 杨
封面设计: 洪淳甲

ISBN7-80527-322-7
H·12 定价: 5.45 元

序

马学良

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我发现他天资聪颖，好学深思，不但对现代汉语有独到见解，他还认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极为丰富，应该与汉语作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研究，给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做出较大的贡献，因而语言工作者应继续去探索和拓新。这是赵杰同志在大学时期就立下的宏愿。不久因学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他自知要实现他对语言学研究的志愿，必须继续深造，提高语言学的理论知识。因而他更加刻苦努力，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徐通锵、林焘教授等，研读语言学理论和实验语音学，坚持学习满语文，特别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满语语言的语音和语言结构，并远涉黑龙江和新疆。

实地调查满语方言土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表了《现代满语研究》专著和其他有关科学论文，分别获得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科研优秀奖的一等奖和学术“十佳”二等奖，为阿尔泰语言和汉语相互影响和满汉语言接触的历史成因提供了科学的论据。

我们知道日本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教授 1985 年出版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从语言在地理上表现出的类型推移，把“横”的区域考察与“纵”的历史性比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其中论述“东亚大陆语言形成一个完整的连贯体。构成这样一个连贯体的各种变异的原形概貌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就是基本上单音节的，修饰语后置于被修饰语的、富于类别词的声调语言”，并且指出“过去一千年间的历史，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原’地区被金、元占领了三个半世纪，清又统治了将近三个世纪，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都处在北方阿尔泰诸民族的控制下”。（以上引文均见《语言地理类型学》185 页）于此可见，汉语不可能不受阿尔泰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出于互借，还是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这是中外语言学界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的重要语言，并有较古的满文和丰富的满文档案，是研究阿尔泰语言和历史的珍贵资料。赵杰同志有志于此，写出《现代满语与汉语》等著作，就是为解决这类问题作出的研究成果。书中力图在分析描写满语发展的同时，联系满语和汉语进行横向的比较，对某些双语现象重视理论分析，重视对历时演变原因的解释。据我所知，满语包括与之相关的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的研究，中外学者已做出不少的成绩，但若作历时的比较研究，无论语音和形态

结构等都还要进一步正音和科学的分析，才能提供比较研究的准确材料。寄希望于赵杰同志新一代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更大更好的成绩。

1992年 秋
于中央民族学院

导 言

随着国际间经济文化的迅速趋一，世界缩小得像个村落一样，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民族语言也在迅速走向双语或融合。因此，19世纪诞生的以研究语言的分化为主体的发生语言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充分发展以后，今天正在向以研究语言的统一为主题的语言接触学转向。人们在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时，已经不再仅仅注意到纵向的遗传因素。他们发现，在语族内亲属语言间内在的演变规律后面，还有一种外来语言的横向影响不可低估，特别是在历史上异种文化交融，语言接触频繁的多语地区，这种影响不仅会构成一种强大的威力，而且也能形成一些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总结的规则迥然有别的新规律，甚至在历史比较法中语言同源成分等一些根本的问题上，语言的接触、融合、统一的研究也对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语言接触学引起的语言变化，也能导致同源性的相似；社会环境的因素，也能导致某种语言改向。这些结论已不再被正统的历史语言学家一概否认了。事实上，几千年来世界上语言发展变化的真正路径确是纷繁复杂的。传承到当代的各地语言是多种促变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从总的趋势看，仍然可以分为纵横两大流向，它们都源出于但又大大地超出于19世纪施莱赫尔的“谱系树”和施

密特的“波浪说”。历史比较法着眼的亲属语言同源成分基本词有系统有规律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及空间的差异反映时间的发展，并行的心理机制和 drift 所引起的结构不平衡性，都在印欧语系用语素形态的相似性寻求共同来源中得到过大体的证实。但是，语言接触学着眼的语言横向干扰和双语环境中的诸多社会因素，也成功地解释了一些语言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事实。皮钦语 (pidgin)、克里奥耳语 (creole)、混合语、借用、底层、语言转换等接触模式，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深知。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产生于正常遗传的发生学诸要素的演变规律性，由于生活在语言接触的双语社会环境中，常常被干扰，被打断，进而使正常的语言要素改到另一个发展方向。尤其在语言接触有时间深度的地区，双语中任何一方的发展都难以仅从发生学模式来解释。我们不能假设任何非发生关系语言的结构特征在一条简单直线继承的单语源上发展。即使是发生学规律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印欧系语言，也需要某些语言接触学的模式和规律来填补纵向发展史上的一些难以说清的空白。事实上，许多语言的发展演变史正是结构内部的纵向演变和其他语言的横向影响双重交织进行的。要分清一种语言纵向继承和横向扩散的两种促变因素决非易事。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一般学者在观念上往往忽视语言接触，二是对双语社会中语言接触的规律和模式远不如历史比较法那样清楚。

因此，研究和探索世界诸语言中的双语接触理论，就成为语言学界一个十分迫切的学术课题了。

自从 19 世纪后期施密特提出“波浪说”之后，语言接触理论的探讨其实并没有中断。后期的德国方言地理学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后来的语言学家苏哈德曾作出自信的推断，

“所有的语言都是混合的。”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们调查西部印第安语时所发表的大量论著，都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博厄斯在经历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后，深信混合语的存在。后来的格林勃格在语言类型接触及用词汇比较建立发生学分类方面，怀恩莱希在强调基本词汇的接触和横向影响方面，拉波夫在语言变异和王士元在词汇扩散理论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为语言接触学的发展作过应有的贡献。近年来，美国语言学家 Sarah Grey Thomason 和 Terrence Kaufman 对语言接触的诸模式和历史比较法的发生学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总结。他们认为，语言发展史上非发生学发展的语言演变模式有三种，这就是：

1. 从别的语言借用太多就会使发生连续体的语法系统受损（虽然基本词汇大部分未受损）；

2. 突变克里奥耳产生在多语环境中，这里没有迅速离开母语的公共语，大家学的仅是词汇不是大量语法结构的目的语；

3. 皮钦语也产生于多语环境中，这里，说话人没有均分目的语，不包括语言转换，而是有限的语言为了有限的交际目的。

三种类型可并成两个，因为母语化的长期的皮钦语和克里奥耳相同。（《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P₂₁₁,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遗憾的是，以上所有的西方语言学家在其论著中尽管旁征博引世界各地的语言材料，但对中国这个语言接触的巨大宝库却所知甚少。即使谈到原中俄边界的恰克图话，青海省同仁的五屯话等现象，也因材料所限，没能谈深谈透。而中

国最重要最丰富最典型的双语接触恰恰是满汉语言的接触。这种接触无论是汉语影响满语，还是满语影响汉语，都带有人们密切关注的典型意义。因为前者以其满语衰变以至消亡的特殊性将会极大地丰富国际语言接触学理论，后者以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受益于满式汉语，北京话作为世界几大都市的权威方言之一，也将成为整个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所以，满汉语言接触的深入研究的确是十分必要的。

二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他发祥于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间，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肃慎祖先的活动记载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公元1153年，满族的前身女真完颜氏率部南下，入主中原，与宋朝南北对峙，统治北中国近120年。在这期间，金代把北京作为中都，史载女真贵族当时就是双语制。他们把中古以后以幽燕方言为基底的东北汉语带上了女真人的口语色彩，成为金朝时期北京的官话语言，以至于女真子弟渐渐放弃了女真母语，金朝皇帝不得不把太子送到东北老家的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去学习女真语。元蒙政权入主北京大都，实际只有89年，并且50%的女真人没有回关东而定居在北京及华北诸地。这期间，蒙古族与“汉人”分居，使得同为一等的女真人和北京汉族继续熟用金式汉语。明朝1421年迁都北京，原来留守在北京的明朝燕王的势力非常强大，作为下江官话的南京方言（含朱元璋家系的安徽话）对北京早已形成的金式汉语影响并不大。与此同时，东北女真人“再起东山”。15世纪末，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的两大女真部落相继并行南迁。建州女真人途经长白山，进驻辽东抚顺、新宾一带，开始学用汉语和明人交往，身为明代

下层军官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年轻时就熟通汉语和汉书，喜读《三国》、《水浒》，并经常往来于北京、盛京（今沈阳）之间。海西女真人途经东北大平原的发达地域，进住辽北铁岭、开原和吉林南部的四平一带，与明人的商贸、马市往来十分频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1616年建立后金，在和明代辽东官兵的近30年的征战中，女真人和汉人经历了分合杂居，习俗相吸，文化交融，商谈市语，通婚联姻等全方位的接触，汉语水平普遍提高，双语覆盖面明显扩大。到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金”为“清”，改民族“女真”为“满洲”时，满族人的大部分已经熟通汉语了。1644年，清军倾八旗主力入关，顺治皇帝进京定鼎，清朝继先世女真的金朝之后，又一次在北京使用着相同口音和言语特点的汉语官话，表面上是由金式汉语改成满式汉语，实际上是幽燕汉语的同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变体。

满族入关后，由于统治众多汉人的政治需要和星罗棋布分散于汉语广袤疆域中的客观形势，自己的母语——满语也开始全面地向满式汉语过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还在使用着满汉两种语言文字，但到乾隆末年，北京已经不再使用满语口语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全国的满族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满汉双语制到满式汉语单语制的替换。满语得以保存的地区只有“两江一河”，即东北黑龙江、嫩江沿岸的满族村屯和西北新疆伊犁河沿岸锡伯族聚居的诸乡镇。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

清康熙年间为戍守边疆，抵抗沙俄侵略，清廷从长白山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一带）抽调大批满族人组建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八旗水师。这些说满语的旗人原在黑龙江东岸，后因中俄战争移到瑷珲（今黑河附近）沿江一带，以后又有一

部分随将军衙门府迁徙到墨尔根（今嫩江县）、富裕和齐齐哈尔，沿嫩江流域又形成八旗水师村屯。两地因小兴安岭阻隔，各自偏安一隅，远离汉人聚居。直到解放后土改运动和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进入，才打开了满汉接触的大门。所以两地至今还有中老年满族人在使用满语。

清乾隆年间，为巩固平定西北准噶尔叛乱的战果，清廷从盛京抽调满洲锡伯营（当时他们说的是东北满语）去西北定居戍守。几千锡伯兵民从东北途经外蒙古和阿尔泰山，历经一年时间到了新疆伊犁，分驻在霍城、伊宁和察布查尔一带。锡伯营作为八旗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和新地异族的维吾尔、哈萨克人很少来往，他们活动在驻防的城地，说着从东北带来的满语，为保卫清朝赢定的祖国西疆世代屯居，直到1937年才废除八旗制。他们和维、哈、汉族大量的接触是解放后的事。所以，带有锡伯族口音的满语方言在今天仍然运用在察布查尔的八个乡中。

除了这三个集中地点之外，关内一些原八旗驻防地也存有一定程度的满语，但更多的却是铺有一定满语底层的满式汉语。这些说旗人话的方言岛星星点点地分布在汉语各大方言的汪洋大海中，虽然也都不同时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地方言的影响，但有趣的是，他们的满语不说了，可带有浓厚京腔味道的满式汉语却始终长期不改，不管受周围多么复杂多么难懂的方言音系的“围困”。因此，各地常称这些八旗后裔是说京腔的北京人。

外国人至今仍以 *mandarin*（直译为“满大人”）来代称“北京官话”，实际上就是这里所指的满式汉语。这种满式汉语是女真、满族和金、清政权与汉族接触后的一份文化产物，也是他们由满语改换成汉语过程中的一种语言成果。它在清

初形成之后，有清以来对原金、元、明时期的汉语北京话进行了有力而有效的改造。首先，作为天子的皇帝和文武官员、八旗贵族都说这种话，特别是康熙、乾隆等皇帝不仅善长“国语骑射”，而且精通汉文诗律书法，带头使用汉语古白话和满式汉语口语，北京内城旗人不可能不去模仿。南城汉人本来说的就是金式幽燕汉语，无论在主观愿望还是在客观条件上都为模仿满式汉语提供了便利；其次，清代以来的旗人作家大都使用满式汉语创作，尤其是风靡明清的小说语体，在清代改成这种满式汉语更能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民国以后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正红旗下》等名著，乃至今天满族作家王朔参与创作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都曾经在北京全城引起过京腔热的“轩然大波”；第三，自1644年始，大清朝廷和清军八旗的一半留住北京内城和京畿，这些众多的人口和“上等”的满式汉语，对明代本来就是以金式幽燕汉语为底层的北京话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清末至民国短暂的时间，学术权威们又倡导过“国语运动”，解放后不久，国家就把北京语音定为标准音。所谓“国语”和“标准音”，虽然不包括个别的土音土词，更没说是mandarin，但实际上其主体就是满式汉语。新中国高度统一化的40多年，使得首都的北京语音越来越国语化了，以满式汉语为主体的北京话正在迅速地缩小着和普通话的距离。

三

一般来说，两种不同的语言接触情况导致的混合语有两种促变源，即借用现象和底层成分的干扰。汉语影响满语使之衰变和逐渐消亡的主要因素是大量汉语借词的渗入。满语

影响汉语使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话带上了强烈的满式汉语色彩，主要是因以满族人为代表的旗人的语言风格和部分满语底层的铺垫作用。但是，满语衰变、消亡和满式汉语国语化的根本原因还是满族人语言替换的结果。

在双语接触的通常情况下，原单语制的被统治民族在统治民族的社会强势中变成双语制，进而转变到新的单语制，但也保留底层的词汇和部分语音，语法却是新语言即目的语的体系。满汉语言接触却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满族人进入辽沈和入关以后，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但由于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于汉族，又不得不受治于汉族发达深邃的经济和文化。语言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它是文化要素中最表象却又是最实用的形态。大清朝廷和旗人贵族恰恰是在这个外化形态上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语言转换的工作。也就是说，满语向汉语的转换不是别的统治阶级的强迫同化，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本身利用统治条件自愿转化的结果。在这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满大人”(mandarin)自行推广汉语标准化的人为因素要比任何外来强式语言的影响都要有效和迅速得多。

有清一代，转换语言的满族人在从满语母语到汉语目的语的学习中带进了他们母语的一些语音语法特征，这些特征由于使用在康乾盛世人们所崇拜的皇族语言中，它也能反过来影响汉语目的语，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引起转换干扰的词汇扩散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语音和句法的干扰都要比词汇的干扰更紧要，除非当正在转换的人口转向目的语时，目的语的母语者从转换人的语言中借了一些特征。”(《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p₁₂₂) 满语影响汉语正属于“除非”以下的这种

特殊情况，我们现在的北京官话实际上正是满族人在清代转换语言的过程中习得的并且带进了一些满语结构特征的目的语。这种目的语带有浓厚的旗人“京腔”（老舍先生语），但更重要的是，旗人创造的大量的汉语词汇，不断地被北京官话区的汉人所接受，所喜用。北京官话正是满语转向汉语的过渡进程中不断积累满汉语两种新特征的产物。这种产物在首都北京，就成为外地人模仿学习的权威方言，它一旦被标准化，词汇上就容易受到外地方言的补充，语音上就容易受到外地方言的模仿，各地汉语方言随着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靠拢的需要，也就加快了向北京官话（mandarin）演进的步伐。这种产物在外地方言区中，就成了一种旗话、军话或官话的“京腔方言岛”。

四

这本《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正是通过对满语（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和汉语古今情况的接触比较，在描写分析衰变的满语和简变的汉语的同时，揭示语言接触中普遍存在的相互借用、渗透和影响共同规律。全书力图为国际语言学提供以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接触为题材的语言融合的典型，继而在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借用”、“底层”和“语言转换”等双语现象中提供新的语料，阐释新的见解。

书中的16篇论文绝大部分是继作者的《现代满语研究》专著之后所发表的习作（出版刊物和日期详见每篇文后）。这里略对其中几篇作一提纲挈领的介绍。《汉语的影响和满语的连锁式演变》是一篇硕士论文，该文在已有的现代语言接触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前人所论及的借词现象，用满语音系在汉语渗透下连锁式音变的详细事实，推进现有理

论，明确提出借词能使固有语言的内在结构脱轨的新结论。《论满汉民族的接触与融合》通过满汉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密切交往，深论满族汉化的原因，进而分析中华民族优化融合的具体演进过程，从中论证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汉语的影响和满语语法的递变》首次阐明了汉语影响满族语言的深层思维方式，并使之语序变换的新鲜事实 and 变化原因。《京腔方言岛调值的一致性及其历史成因》是一篇论述现代汉语受满族和满语影响形成当今北京话的新作，旨在从共时平面上东北重镇京腔的音高和北京话音高的比较和语音实验中，并从语言社会因素横向影响的角度开辟研究汉语北京话的新途径。《满语的变化》通过对东北黑龙江边陲偏僻村庄中的活满语的分析，以及对清代北京朝廷内使用汉语情况的回顾，具体解释满语在内地消亡，在边疆衰变的原因。《锡伯语满语音演变的比较》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清代满文和现代黑龙江满语、嫩江满语、新疆伊犁锡伯语的空间差异中，嵌入汉语渗透的社会背景，论证清代满语和现代满语方言间的时间发展序列。《泰来满语音位解析》是对笔者首次发现的黑龙江省嫩江流域的泰来活满语的语音系统所做的全面深入的微观描写，文中对处在汉语强烈影响下的泰来满语的音位和音素作了较为详细的理论分析。《官话迁徙与京腔移植》对满族影响汉语形成北京官话的历史社会大环境作了细致的溯源后，对内蒙和东北官话区内的清代重镇作了语言文化上的印证性分析，以此说明满汉接触形成的京腔核心圆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进而指出，幽燕汉语的迁徙和满式汉语京腔的移植是北京官话的两大成因。

这 16 篇论文均是笔者 1986 年至 1991 年间的作品，尽管上述简介的主观想法是良好的，论文也大都在发表后得过不

同程度的学术奖励，但对于专门从事语言发展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是否这些论文真的达到了笔者自我感觉的学术水平，还需要他们的批评和指正。更需要生活在双语环境中特别是满族汉族广大读者阅后不吝赐教。正因为如此，把这些论文汇集成书，既便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集中评论，又便于有这方面兴趣的读者一并参考。由于这些论文大都发表在有关民族语言的杂志上，这样成书出版，更便于听取汉语语言学界师长和同仁们的宝贵意见。

马学良教授作为全国民族语言学界的泰斗，80岁高龄仍然带病为本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我只能用多出成果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老一辈语言学家对我们青年学者的亲切鼓励和关怀。

辽宁民族出版社在出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奖掖后学，毅然承诺了这本学术性强，排版困难，经济效益不高的著作的编辑工作，他们为出版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不辞辛苦的奉献精神，他们对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大力支持，将永远成为笔者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动力！

赵 杰

1992年10月于北京大学中关村